



陈啸一著

# 海派散文：

婆婆的人间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啸／著

# 海派散文：

婆婆的人间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散文:婆婆的人间味/陈啸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61-7116-5

I. ①海… II. ①陈… III. ①散文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3353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戴宽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303千字  
定价 69.00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吴福辉

陈啸“读研”的时候做的是京派散文，后出了书，现在又顺势做起了海派散文的题目，他可能想象不到，这无形中替我还了一笔重要的“文债”。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出版了研究海派小说的论著，当时，李君维先生（笔名东方蝓螭）将拙作拿去给他朋友圈里的前辈同辈们看，其中就有曾经拉他担任过上海《世界晨报》编辑的冯亦代先生。冯先生并未得我赠书，翻读后竟兴致勃勃主动写了篇书评，让我十分惶恐也着实感动。这篇发在《瞭望》上的文章除了认为海派小说研究的意义，是在于“开启了中国文学研究中无人亦无法问津的都市文化”，还指出我之不足，“可惜他只写了小说一门，其他如诗，如散文，如戏剧，甚至是上海小报上写‘豆腐干’一块块的专栏文章，他都没有触及”。（《读“海派小说”之余》）今日我可以告慰冯先生的，是我虽不才，但在我指导下的学生这十几年里却已做完了从杂志研究（刘铁群）、海派小报（李楠）到海派戏剧（尹诗）、海派散文（陈啸）诸个课题，手头的学生还在做海派作家迁徙香港后的论文（鹿义霞）。做得如何自然可勿论，但我们师生聚在一起，总算是实现了这个全面述说20世纪海派文学的愿望。我也可以直面冯先生了。

“海派散文”是个繁重吃力的课题，这不难想到。几十年尘封的沪上报刊需要一一翻录查找。谁是海派散文作家？写了多少散文？有多少不同个性和风格？有何价值？都是前人没有留下现成答案的问题。好在陈啸现在用了数年之力，钩沉爬梳，理出了一个头绪。他的成绩便在于在文学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海派散文”的地位。由他给“海派散文”做了初步界

定，分析了它的现代都市发生语境、生成的过程，提出了固有的作家群体和代表性作家，厘定了基本的作品和形态流变，以及与其他散文和文体的互动互补关系等等。按照他全书对“海派散文”的定位，这是现代都市文学的一个必然的分支，一个合理的补充，必将给现代文体分类研究带来一定的推动，并且必然是对整个“海派文学”进一步的完型。研究的水平自然有深有浅，所提出的一些局部的概念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不过他究竟迈出了这新鲜的一步，是可喜的。

任何局部的历史都是更大范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水花，长环中的一个节点。陈啸在其海派散文研究的成果里，便悟到了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的根本路数，那就是衔接、对抗、失衡、渗透、融合。海派散文形成的资源首先是晚清报章文体，但处于更近位置的还是五四散文，所以本书在论证海派散文产生过程时一方面是注重现代都市文化环境的影响力，一方面就特别注重《语丝》在上海如何分化，沪地新起的作家如何围绕《论语》而崛起的史实。这样，海派文学的生长史就凸显了“京海合流”的力量，突出了周作人、林语堂两人的一定的作用。这种历史多面衔接和多元渗透的研究，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要比只讲对峙、只讲单向发展更加错综，更符合历史真相。“京海合流”不过是我举出的本书的一个例子而已。

论及海派散文的本体，此书抓住了典型的文学现象，借以做出合于文学研究规律的细致剖析。海派散文的三个典型现象根据作者的归纳是：更依赖也更能利用报刊媒介，更能开拓文学的空间，更能对现代都市性进行想象的再创造。对这三个紧要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彼此独立并且相互联系，便形成全书颇有特色的结构。论述按此次第展开，便避免了目前普遍存在的重复研究的弊病，有了自己的另辟蹊径的语言。比如关于“文学的媒介化与海派散文的非文学化”的大胆命题，便具深意存焉。其中论述海派散文的道德感的升降、“真美”的幻变、流行色的风趣及短平快的浅陋、传播方式的改进和实用趋向等等，均能切中要害。而依据消解文学性的斑斓和加入新闻性的芜杂之后的海派散文特点，提出“杂散文”的概念，也能道他人之所未道。对于散文空间化一题也是如此，虽不能尽善尽美，但论及散文的时间与空间之关系，散文空间化的各项表征功能，和散文空间

形式中的感性空间、私密空间、色彩空间等，也都能自圆其说，提出个人的看法。至于海派散文对日常都市性的重塑作用（都市产生了海派散文，海派散文反作用于都市），在分辨了现代日常和传统日常的区别，在寻觅了现代都市对于“人”的意义之后，所评价的市民哲学——“安稳即道”，也颇意味深长。长久以来，我就曾以“如何细读散文？如何阐释散文”这样的题目来与作者讨论，以期通过一种散文的研究来窥视整个散文的研究。现在从此书看来，作者已经有些体会。能在一个全新的课题之上加以新的探索，处处显示出青年学者的蓬勃精神，这是可取的。

作者也认识到自己目前对海派散文认识的不足，尚有未尽之处。有的角度和层次虽已意识到了，比如海派散文隐现的“原乡印记与创伤记忆”，这实际是对“都市性”的深入认识，但从他安置的论证地位来看，仍不免举棋不定。还如海派散文的“文学审美性和文化本体性”的命题，几近呼之欲出了，如果假以时日，给他研究的余裕来仔细打磨，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

现在的学术环境说得严重一点，真是危机四伏。我们一年年地培养着硕士博士，学术队伍从来没有如此庞大，学术经费等物质条件从来没有如此雄厚过，但学术规范、学术风气、学术承传也从来没有跌到如此的低水平。大学圈子和研究界充斥着一种“快餐文化”的韵味。在这方面，我希望陈啸能力戒浮躁，安心坐牢冷板凳，在初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领地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是为序。

2015年4月18日于小石居小病中  
想着鲁迅称小病是“一种福气”的话

## 我与三月江南(代自序)

在中国文学的悠长历史中，“江南”早已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一经历代文人骚客诗文的歌咏，“江南”成为“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的迷离意象，足以勾起无数中国人无限美妙的联想，诚如韦庄词里云：“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江南最美是春天，烟花三月的江南无疑最能代表江南的“美”。那“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诗意画意不知让多少人为之迷醉。然而，江南的婉丽富庶对于像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却长久地停留在古典诗文带给我的空洞的想象里。

我出生于三月皖北的乡村，“三月”是诗意的春的季节，但故园的“三月”仍然滞留着冬的萧条，确没多少诗意，如果有，也仅是种点缀，绝没有江南的秾丽与凄迷。因“三月”而将自己与“江南”勾连起的间接关联显然有些牵强。我与“江南”本是有“隔”的。长养我的故园地处苏鲁豫皖交界，为黄河流域，江淮大地。著名的淮海战役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故园古属徐州（古九州之一），平川广野，山多为丘，起伏不大，多光秃。在悠长的历史上，皖北出过皇帝，也出流民，“穷山恶水出刁民”是毁之者对它的惯常概括。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片土地是与荒寒、空旷、孤寂相连的，即便是今天，也依然被很多人称为“安徽的西北利亚”。当然，作为故园，我是爱她的，她是我灵魂的家，这里有我的生命之根。说起故园，自有一种偏执的爱。倘要我说出她的“好”，同样可以如数家珍。这里有八仙张果老成仙的传说，有汉朝二十四孝之一蔡顺摘桑孝母的动人典故，是汉孝善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是南朝

皇帝刘裕故里，……4000年的文明史，2700多年的建城史，有的是厚重与沧桑。

这里有唱腔粗犷的梆子戏，有板式富丽，旋律优美的花鼓戏及坠子戏，有融南北之优长的剪纸艺术及泥人艺术……在历史的苍茫中，仿佛可以触摸到皖北人自在的吟咏寄情的艺术方式。

这里是中国著名的酒乡，萧县葡萄酒，淮北口子窖曾驰誉全国甚至海外。

那多味的撒汤，鲜美的萧县羊肉汤，手撕狗肉，王憨子油茶，丁家壮馍，蜜三刀（一种甜点）等满蕴家乡风味的小吃让远离故园的游子念之垂涎，回味无穷。

这里也曾诞生过“龙城画派”，被称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走出过刘开渠、萧龙士、王肇民、朱德群等享誉全国以至世界的艺术大师。

然而，所有故园的一切，在我的感觉里，似乎仍只能以“粗犷”名之，加之生产力低下所带来的贫穷，比之“江南”的明丽苍翠与温柔绮丽显然有霄壤之别。故园会让我莫名地想起“大分起兮云飞扬”，而不是江南的“乌篷船”“油纸伞”及杏花春雨等的诗意迷魅。“粗犷”当中或许蕴含有气概与豪情，但绝然少有着绵密与细腻，富贵与芬芳，或者说，在我早年成长的地域文化基底里，断与“江南”的俊秀与婉丽存有着距离。

十年前，从恩师吴福辉先生研究“京海”文学，算是自己与“江南”开始有了象征性的关联。我是远离“京海”研究“京海”，比起那些长养与生活于“京海”之地的京海派研究学者究竟又缺少着切肤的实感。不过，研究是一种靠近，其人其文无不对我形成无时不在的暗示与影响，因“京海”文学依然建立了我与“江南”的精神牵连及融通。“京海”文人多有南方人。京派文人虽活动在北方，但其中的很多却为江南才俊。杨晦先生就曾经说过：五四运动是海派势力延伸到北京去，并进而突破了京派的士大夫传统的结果。后来这个海派势力的一部分重新又南下，另一部分仍留于北京接受了士大夫传统。而海派文人则活动于近现代的上海，上海本身即为江南腹地，海派文人几乎全是江南文人或因长期生活于此而江南化了的文人。实际上，因工商业的领先发展，

也使得“江南”之地一度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文化的中心并引领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早起领导人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最早都是活动及成名于“江南”的上海。“五四”前后，北平曾因政治与新北京大学的崛起等原因而成为文学文化的中心，但时间不长，守旧派的北洋军阀与新文化的领导者天生水火不融，冲突不断且日益加剧，发展到后来的迫害以至屠戮。因此，陈独秀、鲁迅、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饶孟侃等新文学的干将们又纷纷南下，上海再次成为文学中心，实现了与经济中心的又一次重合。显然，研究京海文学，也就等同于亲炙江南文人与江南文化。而感悟人，在其生活的每一根纤维里，似乎都可以咀嚼出那特有的文化的意味。以“民以食为天”且习焉不察的“食”为例。“食”即“吃”，“吃”是人之本性，人必以“吃”延续着自然的生命。但“吃”在于文人，却似那样的雅，而且常将“吃”的趣味入诗入文，百谈不厌。这似乎是文人的通性，不独江南文人，如孔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范仲淹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等等。“吃”体现的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以及对生活的热爱，这与作为生活反映的文学艺术有着内在的沟连。但在江南文人的津津乐道的谈“吃”的文字里却常常显现出佳丽地，富贵乡的优裕与精致，体现出江南的滋味，是长养于此的文人因内而符外的自在显现。那“故乡的野菜”与“茶食”，臭豆腐干、冬菜与红米饭，高邮的咸鸭蛋，微风中的咸水花生，“宁波人的吃”，年三十晚上的爆谷花、接灶圆子以及五花八门的吃酒等，无不体现出周作人、丰子恺、汪曾祺、张爱玲、苏青等的本色与祥和，优裕与安然，显现出“江南”的风雅与情韵。尤其是，《海派散文：婆婆的人间味》，这本小书，更是集中体现出我与“江南”的亲近。散文是一种强调自我、诉诸心灵的艺术，文化与散文的关系是一体两面的表里关系，它体现在两者于人的情感和心灵的共质。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散文文体的内容以至形式，而散文文体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体现文化的内涵与个性。或者说，摩挲不已的海派散文更让我近距离地感悟且不自觉地认同着江南文化。

诚然，京海文人更多关注的是由乡入城的心理震荡及都市的日常性，

但其视角之一隅所关涉到的“江南”的“美妙”也无疑让人沉醉，这是孕育其人其文的深厚的土壤与大气候。比如：“江南”之“雨”在海派文人施蛰存《雨的滋味》（1930年）一文里变得美轮美奂，诗意盎然。试看：烟雾般的雨丝笼罩下，杨柳“曼舞低颦”，花儿“滴粉溶脂”，远处山水失去了边际，斜插入画的“黄莺”与“红襟燕子”更似一个美的点缀。而且，又因这“雨的滋味”联想到古典的美人：长满了绿苔、散着落花的幽幽庭院里，春雨亦或秋雨静静落着，半掩的门中，“可以窥见室中陈列着的屏、帷、炉、镜之类”，一位美人“在静悄悄地无端愁闷”，以颐望落花，倚屏弄裙带……。“雨”与“美人”相得益彰，韵味无穷。“美人”因“雨”而迷离，“雨”更因“美人”而袅袅。“秋”常意味着萧索，尤其体现在北国及北国人的眼里，但倪貽德笔下的江南之秋却别有一番诗意与情调。“天宇暗淡”，“草木凋零”，“秋蝉声苦”，“月桂香清”。“秋”是属于艺术家的，那色彩浓艳的春天“毕竟只好让俗人去玩赏”。（《东海之滨》）“春天虽是娇美可爱，然而她的趣味毕竟是太浅薄：令人一望而无余味，这如同看了轻佻的喜剧，虽有一时的快乐，而无深刻的印象。夏天未免太流于庸俗，我们只要被那种恼人的阳光照着已经够烦闷欲绝了。只有这秋天的情调最为可爱，她虽是悲哀，但这悲哀之中仍有不尽的快慰；她虽是善泣，但这泪珠儿终究是甜蜜而有余味的”。“秋是追怀的时期，秋是堕泪的时期。”初秋“清凉的晚上，悠悠的微风吹过，使人把长夏的烦恼顿时忘去。”（《归乡》）倪氏还把秋天比作“一个美貌的女子，到了中年以后，她娇嫩的容颜慢慢的憔悴了，她浓黑的华发渐渐的稀少了，她往日的恋人也弃她而去了，到这样的时候，她一方面既感慨那似水的流年，一方面又还时时在眷恋着她那如花的青春，然而春花是一去不可复回，年华又一年一年的流向东去，她无可奈何，只是暗暗的背人流泪的样子，一般的具有美妙而悲凉的诗的情味”。（《秦淮暮雨》）诗意的江南给了倪氏诗性的眼睛，萧索之秋似乎也便因此有了唯美的意味。

缘于京海文学（更多是海派），我对“江南”有了观望与永恒的驻足。心醉“江南”之际也自然体悟着“江南”之于我的意义。“江南”对于我，并非实有，更多是一种想象。我是“江南”的仰望者。曾几何时，“江南”成为我的精神领地，想象的空间，更是诗意栖居的天堂。“江南”

有动人的美，这种美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易于勾起原乡梦。在现代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都正处在“离乡”的路上。工商化的进程带来了乡土中国面影的模糊及传统伦理的变迁。原有的乡土中国的一切风俗习惯，地方文化人格等，在渐趋消融与消解，开始着有现代城市的特性。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对环境带来的破坏更是触目惊心，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也正在成为人类奢侈的想象。人类在享受着城市带来的先进的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同时开始失去那传统乡土文化诗意的灵魂的家。现代人对工商都市的亲近与融入的途中，不自觉地也有着隐隐的原乡情怀，那对于祖居之地与故土族群本能的回归意向，或者说对传统乡土诗意文化的眷恋。以类似于我这样的第一代由乡入城的人来说，虽居城多年，但似乎根还在乡土。灵魂的深处，乡土似乎就似我精神的沃土。那里有着自己太多的记忆。这种对家乡的思念与情感的皈依正是所谓的传统的乡愁情结。实际上，乡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乡愁文化。“家”是中国人的血脉之源，精神的堡垒，风筝的根线，农工商兵等各色人等难免有离家远游的际遇。离家即为“游子”，并因此恋想家乡的宁静、温情与诗意。然而，现代中国的乡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京派文人那里就已深刻地意识到资本渗入乡间所带来的对乡村文明的冲击及其种种的失望与不如意处。时至当下，资本文明对乡村的浸淫更为明显。它在改变乡村一切传统的和平、率真、淳朴的品质。或者说，商业文明在带来方便、知识与亮光的同时，却也消解了传统的诗意与温馨。今天的乡村与农民早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简单地依附于土地且以土地为主，而是更多地带有工商文明的特性。就我每年春节回乡的感觉：本来，团圆与温情应是春节的核心主题，然而当下的过年似乎变成了“显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联系也多有失落。走亲访友也多不是为了交流感情，而是变成了一项既有的任务，会面时的“寒暄”也变成了没有多少内涵的客套，甚至是收入多少的讨论。开私车回家常常成为今天的农民工回乡过年在外发财的标志与象征，也是最直接的炫耀方式。交通阻塞这种发生于现代城市的文明病在今天的乡村也变得依然严重。因为都买车了，而买车人并不仅仅为满足回乡的方便，更多为了虚荣的“炫阔”。车的价位、档次不等，只要是车子（更多的农民也并不意味着车的档次），就证明着自己“衣锦还乡”，其买车的意义

远远超越了“交通”的本身。我有一个表亲，因经商暴富开着一辆一百多万的奔驰回乡过年，就足以成为他傲视一切尤其是知识的资本。资本向农村的渗透更带来了乡村工业垃圾的堆积成山，环境恶化日甚一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城市的垃圾尚可集中焚烧或掩埋等处理方式，而今天乡村的工业垃圾是基本无人问津的，传统自然的分解方式解决不了时也就任之由之了。而我的这种闻见并非我的家乡独有，已经具有了普遍性。最近网上爆红的上海大学《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乡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就曾详细记录有类似的情况。正因如此，温情与诗意的“江南”也就似乎成为“我”以及如我这样的人的替代性的精神意象与心理补偿，成为我精神意向的“家”。不仅如此，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江南”意象足以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家”。“江南”文化发生于中国最为富庶也最集中代表中国人向往的长江中下游的乡土，“江南”意象历经时间的淘洗，早已形成一种美妙的意识深入很多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也是乡愁精神的共同体，即人在文化中的生命的意义。正是在如此的意义上，“江南”意象象征着整个中国人隐性的原乡心结。它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地理位置，代表着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上的精神家园、母体文明的不自觉地回望。然而，让人扼腕的是，随着近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江南”的“美妙”受到了冲击。海派文人也曾表达过对“江南”的失望，并因此感到忧郁与不安。叶灵凤在其散文《煤·烟·河》里就思考与批判了近现代物质文明给“江南”带来的污染。他说：现在的江南，尤其是上海，如林的烟囱冒出来的煤烟，混沌腐臭了的上海的河流，已经摇撼了“江南明媚静谧空气中的诗意”。“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古人笔下的“江南”多么纯净与明丽！即便带有忧愁，也多是伤春惜别及其因美妙的江南而勾起的流连的哀婉。而叶灵凤感性的“忧郁”中则不无渗透着“乡愁”与“乡思”——那失去灵魂之“家”的痛。

一定的意义上，我以“江南”的意象与想象拯救因现实而带来的内心的悲感，但又因“江南”的失落对现实与未来变得迷茫。“江南”之美似乎也不再是一种永恒。“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今天更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也正试图努力的方向。历史与想象中的“江南”正似风光明

丽、文化繁盛、富裕温婉、天地人和的别名，也恰是乡愁文化的象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以“温情”与“诗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在都市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希望“江南”意象并非仅仅停留在记忆与想象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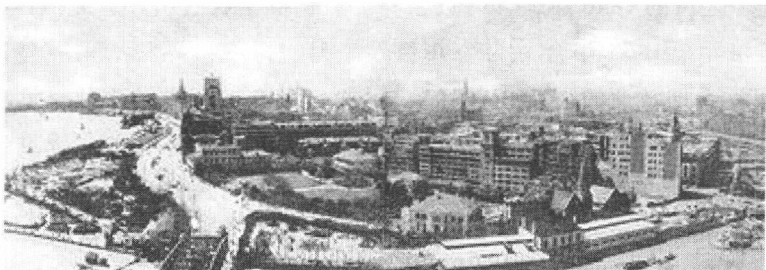
2015 年 3 月 3 日

# 目 录

|                             |           |
|-----------------------------|-----------|
| 序 .....                     | 吴福辉 ( 1 ) |
| 我与三月江南(代自序) .....           | ( 4 )     |
| 引论 都会化进程与近现代上海散文的分形 .....   | ( 1 )     |
| 第一章 京海合流与海派散文的生成 .....      | ( 36 )    |
| 一 文学中心变迁与作家群游走 .....        | ( 36 )    |
| 二 “论语派”的意义 .....            | ( 39 )    |
| 三 同源异流与“十字街头”的审美 .....      | ( 51 )    |
| 第二章 大众媒介与海派散文批评观及文体塑型 ..... | ( 54 )    |
| 一 大众媒介与文学文体 .....           | ( 54 )    |
| 二 大众媒介生产了海派散文作家主体 .....     | ( 57 )    |
| 三 大众媒介的前瞻与海派散文的尖新 .....     | ( 69 )    |
| 四 文学的媒介化与海派散文的非文学化 .....    | ( 77 )    |
| 第三章 海派散文的空间化与表征批判功能 .....   | ( 85 )    |
| 一 都市的空间感与海派散文的空间化 .....     | ( 85 )    |
| 二 海派散文的空间形式 .....           | ( 88 )    |
| 三 海派散文空间化的表征功能 .....        | ( 101 )   |
| 第四章 海派散文的“都市性”与“都市心史” ..... | ( 106 )   |
| 一 实生活的审美与“人”的回归 .....       | ( 106 )   |
| 二 形而下的困惑与超越 .....           | ( 180 )   |

|                              |       |
|------------------------------|-------|
| 三 海派散文的原乡印记与创伤记忆 .....       | (203) |
| 结语 近现代中国工商文化的精神标识 .....      | (221) |
| 参考文献 .....                   | (225) |
| 附录一 中国现代性灵文学的存适语境与流变形态 ..... | (243) |
| 附录二 主要海派散文作家简介 .....         | (256) |
| 后记 .....                     | (281) |

## 引论 都会化进程与近现代上海散文的分形



上海老照片

近现代以来上海都会化进程的本质是殖民文化影响下乡土中国的工商化进程。西方工商文化在乡土中国土壤上的扎根发展，其直接的结果是吸引了农村劳动力进城进而促使教育、服务、生产等各类机构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多元分层，并逐渐形成一种中国式混合型及移植型的都市文化——海派文化。海派<sup>①</sup>文化的本质就是市民社会中的江南吴越文化与西方

---

① 据众多学者考证，“海派”作为一种名词称谓起始于19世纪下半叶上海的绘画界与“京剧”界。绘画界的“海派”是指江浙人对一批寓居上海以卖字鬻画为生的画师与画匠的贬称。（朱英：《商业革命中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先后出现于道咸年间的赵之谦、任熊、任颐、虚谷、蒲华、吴昌硕等新画派即被命名为“海派”画家。早在“同治光绪年间，时局益坏，画风日漓，画家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画品遂不免流于俗浊，或柔媚华丽，或剑拔弩张，渐有海派之目。”[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96页。]而京剧中的“海派”（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上海始有京剧，英籍华人在上海开设一家北平式茶园，即仿京式戏园——满庭芳，去天津邀皮黄班来沪演出，很得上海人的肯定与欣赏。于是许多昆曲、徽调、梆子戏、弋阳腔的演员纷纷改演京戏，于是有了混合有其他剧种艺术的海派京剧。）意指对传统京剧“唱做念打”等审美规定的逾越，与京派相对而言。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玛斯（转下页）

工商文化的融合。它不是完形的,而是深藏于各类都会居民的记忆当中。从文化的源流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构成海派文化的根基与渊藪。其范围应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早在1843年11月7日上海开埠以前,以吴越文化为内核的中华传统文化就为海派文化的孕育与萌芽提供了基础。上海地区远自唐、宋、元时期即以港口与海上贸易闻名遐迩。宋元以后,上海由镇升县,更是迅速发展,而至清代,南北中西之货鳞集,上海已成“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843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1949年之前,上海“八面来风”似的移民,更是促进了海派文化的成长。上海开埠之后的1846年,即有英租界。后相继又有法租界、美租界。美租界与英租界于186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起初,英租界和法租界总计长为10华里许,即常谓的“十里洋场”。然而,后来的租界扩张几乎涵盖了今上海老市区的全部。上海开埠之初,华洋泾渭分明。1853年,因发生“小刀会起义”<sup>①</sup>,华人中的富裕者开始涌入租界,因此形成了“华洋杂处”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农村劳动力进城进而促使教育、服务、生产等各类机构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多元分层。如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官僚、绅士、资产阶级、职员、专业人士、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工人、苦力、店员、公务员等。整体上看,当时的市民阶层大致分为四部分:以买办和通事为代表的新式商人;从事金融、商业和实业投资的资本家;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劳动者;城市管理及公共机构的职员与知识分子,他们是城市经济活动和文化消费

---

(接上页)将电影引进到上海并在虹口大戏院公映,由此引起了欧美商人及林祝三、张石川等民族商业者的仿效,于是又形成了所谓的海派电影。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京海之争”则使得“海派”一词影响深远。“京海之争”是由沈从文于1933年10月18日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所引起。在该文中,沈从文并没有用“海派”之称谓,但在批评讽刺那些“玩票白相文学家”时提到了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里的文人。同时也意指北京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的文人。上海的杜衡随之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为“海派”文人作辩解,指出文人在上海的困境。沈从文由是写出《论“海派”》明确批评了“海派”的“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特点。针对沈从文的文章,曹聚仁连续发表《京派与海派》《续谈“海派”》两文进行论争与辨析。当双方论战愈益浓烈时,鲁迅发表了《“京派”与“海派”》一文,作出了著名的“京派”近官是官的帮闲,“海派”近商是商的帮忙的结论。这里是沿用旧称。

① 1853—1855年,上海发生的以刘丽川等领导的上海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与列强侵略的城市武装起义。